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企业人类学

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经济行为

张继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企业人类学

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经济行为

张继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人类学：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经济行为 / 张继焦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ISBN 978 - 7 - 5161 - 9869 - 8

I. ①企… II. ①张… III. ①企业管理 - 经济人类学 - 研究 IV. ①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13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朱妍浩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94 千字
定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王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继焦的这部新著，凝聚了他自 2009 年以来数年间对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结晶。

现代社会是组织的社会。在各类组织中，经济组织（如企业）居于主导地位。我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经济组织与城乡发展》，主要探讨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与城乡发展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应该进行开发和利用。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中，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主体，是如何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这是一个值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深入探索的问题。

继焦在这部专著中，将李培林提出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奉为企业人类学的最主要学科理论，为提升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水平，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从继焦的这本新书，我想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和强化企业家社会责任感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创造性，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对此，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希望企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可以为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一点贡献。

写于 2016 年 9 月 10 日，北京

序 二

尹虎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

继焦的这本新书揭示了新兴学科“企业人类学”的丰富内涵。作者运用“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从社会历史现场选取精粹的案例，运用实证方法，探讨社会结构现代转型与政府职能、经济结构以及企业运行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所提出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意义。这项研究的学科背景清楚，选取的研究方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理论和方法论的继承和创新方面自觉性很强。

继焦的这本新著全面体现了时代赋予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作者站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深入剖析了政府和经济结构在转型社会中的突出作用，在传统的延续中看到了精神价值，在探讨现实问题时没有忽略历史认同，在经济杠杆之外看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力量。作者用扎实的学术实践试图贯彻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不是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判断，有关社会互动和中西互益的新观念，这些都促使作者贯彻了连续统一和普遍联系的有机体的哲学思维，就像本书所强调的——它给予人们的是并存选择的思维，而不是僵化的“模式”或“样板”。

继焦的这部新作以清晰的学术历史脉络，扎实的实证研究案例，有效的阐释模式，统领全书的理论预设，让读者看到一个东西方学人共同打造的企业人类学正在借助学术传统、面对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在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开拓研究领域。鉴于本书的优异品质，特撰写此序言。

写于2016年9月16日，北京

目 录

导论 国内外理论综述与本书的分析框架	(1)
第一章 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企业人类学的新探索	(8)
第一节 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8)
一 美国：从工业人类学到组织人类学或工商人类学	(9)
二 中国：从探讨农村工业化到创立企业人类学	(16)
三 日本：从“工商人类学”到“经营人类学”	(28)
四 企业人类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30)
第二节 企业人类学：应用研究和案例分析	(31)
一 知名企业里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	(32)
二 企业人类学的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15 个领域	(34)
三 企业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科建设	(62)
第三节 企业人类学的最新学术活动及其研究动向	(64)
一 2009 年：企业人类学的安身立命之年	(64)
二 2010 年：企业人类学在亚洲的崛起	(67)
三 2011 年：企业人类学继续发展其亚洲的学术网络	(68)
四 2012 年：企业人类学立足中国，与国际学术界开展 合作	(69)
五 2013 年：企业人类学的世界性影响不断扩大	(73)
六 2014 年：企业人类学立足亚洲，增强世界性影响力	(75)
七 2015 年：企业人类学的世界性影响进一步增强	(79)
八 总结：由中国学者主导的企业人类学已形成世界性 影响	(79)
第四节 企业人类学的最近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81)
一 不断推出新的学术成果	(82)
二 世界各国学者对企业人类学的探讨	(87)

三	不断增强应用性研究和社会影响力	(96)
四	结语：现状总结、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前景	(98)
第五节	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100)
一	企业人类学的“名”与“实”：学科名称的整合	(100)
二	从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看企业人类学的国际性	(102)
三	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展：从传统的到新兴的	(103)
四	研究方法的持续创新：三个方面的转变	(113)
五	总结、思考和启示：企业人类学的兴起和未来发展 前景	(118)
第二章	企业人类学的新范式：对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探索	(122)
第一节	观察经济社会转型的三大方面：新一轮的工业化、 市场化、城市化	(122)
一	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123)
二	企业人类学的新视角：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 城市化	(126)
三	小结：关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 现代化、全球化的初步看法	(137)
第二节	“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 新概念	(138)
一	问题的提出	(138)
二	理论准备和分析框架	(139)
三	从“地方”和“企业”两类案例，看中国的“伞式 社会”	(141)
四	讨论与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下的“伞式关系”——另 一只看不见的手	(150)
五	小结：经济社会转型中“伞式社会”依然发挥作用	(155)
第三节	“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 另一个新概念	(156)
一	研究缘起和问题的提出	(156)
二	研究假设、理论基础与实证材料来源	(156)
三	就业性“蜂窝”结构及其功能	(159)
四	经营性“蜂窝”结构及其功能	(164)

五 小结：对“蜂窝式社会”的总体性阐释	(176)
第四节 对“伞式”关系和“蜂窝式”关系发展趋势的 分析	(177)
一 “伞式”关系的发展趋势及政府行为模式的变化	(177)
二 对蜂窝式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	(180)
第三章 人类学的新课题：从东部到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及其 影响	(181)
第一节 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 分析	(181)
一 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82)
二 影响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	(184)
三 影响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	(187)
四 小结：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企业搬家”	(190)
第二节 食品工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环境污染及其 对策	(190)
一 问题的提出	(190)
二 本节采用的环境经济学理论	(191)
三 食品工业：从东部向中西部的转移	(192)
四 食品工业：环境污染及其对策	(194)
五 小结	(196)
第三节 新一轮产业转移与中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196)
一 新一轮产业转移与中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196)
二 处理好承接产业转移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98)
第四章 人类学视角下的城市转型：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 竞争力	(212)
第一节 “自下而上”的视角：对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 竞争力的分析	(212)
一 引言：从习总书记吃庆丰包子、逛南锣鼓巷谈起	(212)
二 研究思路	(213)
三 第一个层次：微观地对老字号的分析	(214)
四 第二个层次：中观地对老商街的聚集经济分析	(222)
五 第三个层次：宏观地对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性分析	(227)

六 讨论与小结	(232)
第二节 “自上而下”的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老商街、老字号的分析	(233)
一 研究思路：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	(233)
二 “自上而下”的三层次分析	(233)
三 小结	(245)
第五章 民族产业的典型代表——“老字号”企业的现代转型	(246)
第一节 中华民族之代表企业——“老字号”的研究现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246)
一 为什么要研究“老字号”企业	(246)
二 企业人类学研究“老字号”的独特视角	(247)
三 “老字号”研究的学术价值	(255)
四 “老字号”研究的现实意义	(256)
五 小结：逐渐构建“老字号”研究学术体系	(258)
第二节 中国企业是否都“富不过三代”：对“老字号”长寿秘籍的分析	(259)
一 问题的提出：中国企业都“富不过三代”吗？	(259)
二 中国的商业传统源自本土、历史悠久	(260)
三 对“老字号”企业的调研及有关数据	(263)
四 从竞争的角度，看“老字号”企业的长寿秘籍	(265)
五 “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前景	(270)
六 小结：中国企业并非都是“短命郎君”	(272)
第三节 “老字号”企业的盛典性“事件营销”：以上海杏花楼为例	(272)
一 以往的相关研究与上海世博会	(273)
二 分析框架	(277)
三 世界各国企业与中国“老字号”企业：上海世博会上的仪式性“事件营销”	(278)
四 上海世博会：上海杏花楼的典礼性“事件营销”案例分析	(281)
五 小结：盛大的世博会典礼与上海“老字号”企业的“华丽变身”	(289)

第四节 中国“老字号”企业的经营现状与发展前景	(291)
一 受访“老字号”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291)
二 “老字号”企业的经营现状与发展前景	(294)
三 小结	(305)
第六章 人类学的新视角：对“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思考	(307)
第一节 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 “市场型”的转变	(307)
一 文献回顾：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有关探讨	(307)
二 在城市移民研究中重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	(313)
三 影响“经济文化类型”转变的因素分析	(319)
四 城市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 “市场型”	(323)
第二节 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民族企业与民族企业家的 作用	(326)
一 文献回顾：对城市移民、民族企业与民族企业家的有关 研究	(327)
二 对调查资料的描述与分析	(330)
三 总结与讨论：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在形成新的经济文化 类型中的作用	(336)
结语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第四次革命对中国的意义	(338)
参考文献	(341)

导论 国内外理论综述与本书的分析框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至 2010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内外的学者争先恐后地试图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其中，备受关注的—个问题是—中国如何顺利地实行市场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在本书中，我们将探讨的是：在中国的巨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市场转型？其发展情况如何？

— 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主要观点和争论

—般认为，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经营业绩主要有“两只手”，—只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只是“看不见的手”——市场。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① 学者们纷纷借用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进行学术探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革，其根本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社会的基本面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被学者们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另—个灵感源泉。

事实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直就是社会学的老本行。—般认为，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安排，由此将“制度机制”引入经济学研究中。^② 而在社会学领域中，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下，对社会主义国家

①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② Kornai, Já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影响的探讨，则开始于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萨列尼（Ivan Szelenyi）^① 等人的市场转型研究之中。由此，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建立起了以“约束性的选择”为核心的分析框架。^②

在中国和苏联东欧发生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社会主义的研究思路主要是极权主义范式^③和现代化范式^④。然而，对中国和苏联东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生的转型，这两种范式显然都没有足够的解释力。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⑤ 其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1989 年，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0 月号）上发表的《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⑥ 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直接生产者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有利于市场资本

① Szelenyi, Ivan,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8 (Supplement).

② 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近几十年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起源于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其后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参见 Brinton, Mary, C. & Nee, Victor, 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26.

③ 魏昂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需，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参见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④ 对于现代化范式，主要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⑤ 此研究范式弥补了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在 20 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⑥ Victor Nee,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market capital)、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和文化资本 (culture capital) 而不利于政治资本。此理论包括 3 个命题和 10 个假设, 其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 (1) 萨列尼对中欧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 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再分配经济, 并有其一套独特的与再分配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① (2) 波拉尼关于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经济类型的划分;^② (3) 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的新阶级理论: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对生产资料进行控制的官僚阶层已经成为新的阶级。^③ 在之后的几年中, 倪志伟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 但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④

倪志伟的此文此论一出, 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美国, 乃至其他国家的学术界, 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及其争论, 先后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或学说。

戴慕珍 (Jean Oi) 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即一种地方—国家合作主义模式: 中国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改革准予地方政府保留除了上缴国家的税额外所剩的余额, 在此利益推动下, 地方政府就像是一个拥有着许多生意的大企业, 努力利用和整合自己权限下

① Szelen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9;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8 (Supplement); 1983,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An Auto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5.

②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s. by K. Polanyi, C. M. Arensberg & H. W. Pears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③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of Power*, New York: Praeger.

④ Nee, Victor, 1991, “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7;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的资源并参与到企业的行为中去。^①

魏昂德 (Andrew Walder) 主张“政府即厂商”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的观点：强调“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刺激了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以获取较大的财政收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②

林南 (Nan Lin) 提出了“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Local Market Socialism)：“地方”指的是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网络是其轴心），“市场”指的是经济系统的变化（市场机制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意指不远的过去所留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为其核心）。^③ 当倪志伟、戴慕珍和魏昂德的研究都集中在经济机制并分析其制度性的后果时，林南提出了一个强调社会文化力量的研究角度：内嵌于地方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文化力量，使市场和集体机制形成了联结，使旧有的制度和正在发生的转型连在一起。

二 关于社会关系、资源配置与企业发展的有关研究评述

有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指出，产权是一束社会关系，存在着一种“关系理性”^④ 和“关系产权”^⑤。换言之，社会关系也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中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关系作为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他在 1979

① Oi, Jean C., 1985,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37;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1995,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p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44.

② Walder, Andrew G.,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p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③ Lin, Na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④ Lin, Na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⑤ 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年发表的《区别：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① 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是对社会资本进行理论分析的第一位重要学者。他在其199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达成某个目的的生产性因素，它是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②。就像人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将来可以随时取出来使用。

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有两种模式：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中，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更为盛行，而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主义人际关系色彩较浓。两者的区分标志是，支配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两者的差别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制度上的差别。我们可以把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称为“强关系”，把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称为“弱关系”。^③

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记述和剖析了在中国城市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存在及其对稀缺资源的配置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政府充当资源配置主角的情况下，社会关系作为配角也有其不容忽视的作用。魏昂德认为，在单位中，领导者（如车间主任）与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之间的这种庇护性关系，是“镶嵌于”正式组织之中的一种“非正式关系”，是公共因素与私人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是正式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它是附属于正式组织中，以一套不同于正规组织原则——同志加人情的交换规则为基础而形成的“小圈子”关系。^④

中国社会学家李培林等不但剖析了乡镇企业对外社会和经济交换的情况，而且注意到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企业，将特殊关系网络套在乡镇企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上，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却会提高企业对外的

① Pierre Bourdieu, 199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Routledge Press.

② [美]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54页。

③ 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④ Andrew G. Walder,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交易成本^①。换言之，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可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李培林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或亲缘或圈子的特殊主义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产生了“人情信用卡”。^②在既定群体内产生的这种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和交换关系，减少了群体成员之间关系总是局限在一定的圈子里。在与“圈外人”交换时，不信任感较强，要达成某种交换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交易成本较高。

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私营企业家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亲缘、同学、战友、同乡、邻居等特殊社会关系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帮助自己进入经济领域，获得各种生产资源，并促进企业的发展。在乡镇企业的研究领域，中国和德国学者联合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值得注意。^③

可见，在企业资源配置的力度和作用上，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强关系）要比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弱关系）大一些。

三 本书的分析框架：从社会结构角度，把握经济行为

1.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研究

在研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时，费孝通先生于1948年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④“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特征。这一理论是中国内外学者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理论。在10年前，笔者曾经试图将“差序格局”理论从“农村版”发展为“城市版”。^⑤

与费孝通类似，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1967年发表的《纵式社会中

①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7页。

② 同上书，第49—52页。

③ 这个研究计划的主要成果是一套由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如陈吉元和胡必亮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胡必亮和郑红亮的《中国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以及其他五本关于中国五个不同省份的不同村庄的个案研究专著。

④ “差序格局”理论的要义是：人们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22—30页。

⑤ 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的人们关系》^①，是一本用新颖独特的方法研究日本社会结构的著作，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日本社会可以简称为“纵式社会”。

2. 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早在24年之前，李培林先生于1992年就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李培林认为，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除了一只“有形之手”——国家干预和一只“无形之手”——市场调节之外，还存在着“第三只手”，那就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②这一理论命题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在西方十分盛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模式的束缚，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以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至今，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很多影响。^③

3. 企业人类学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为其基础理论

这个新颖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推动了人类学经典的整体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从整个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去看待和分析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分析现代各种的组织和企业。

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其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不再是个案式地研究企业，而是从市场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整体性视角，探讨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社会结构性因素。

中国正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巨变的年代，对于企业人类学相关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无疑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① 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是纵向式的人际社会关系，就是一种居于一定的场所、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上下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参见[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1967)，陈成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李培林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三篇论文里：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③ 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